

「連結性行動」的邏輯： 數字媒體和個人化的抗爭性政治*

蘭斯·班尼特、亞歷山卓·塞格柏格
史安斌、楊雲康 譯

摘要

「從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到西班牙「憤怒的人群」運動 (Indignados)，再到「佔領華爾街」，大規模的、持續性的抗議運動，對數字媒體的使用已經不限於發送和接受訊息。在其中的一些運動形成過程中，正式組建的「紅磚加水泥」的實體組織的參與程度並不高。但其中有一些運動通過使用技術將公眾參與個人化，讓包括遊說團體在內的成熟的正式組織參與到政治運動的進程中。但它們都與我們更

蘭斯·班尼特 (W. Lance Bennett)，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政治傳播學教授。研究興趣：媒介/政府關係、戰略傳播、數字媒體與跨國社會運動/青年參與公民運動。電郵：lbennett@uw.edu

亞歷山卓·塞格柏格 (Alexandra Segerberg)，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興趣：集體性行動的政治、經驗性及哲學理論研究。電郵：alex.segerberg@statsvet.su.se

譯者：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及教授。楊雲康，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華盛頓大學政治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本文榮獲「國際傳播學會」2013年度「傑出論文獎」，刊於《信息、傳播與社會》2012年(第15卷)第5期，739-768頁。

熟悉的那種傳統的、由正式組織發起的社會運動和倡議行為不同。這篇文章考察了當傳播成為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時的組織動因。本文認為，要理解大規模的行動網路必須區別兩個具有重要作用的邏輯：我們熟悉的、高度組織化的、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的「集體性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邏輯，以及我們不太熟知的、建立在媒體網路中共用的個人化內容基礎上的「連結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邏輯。數字媒體的引入並未改變「集體性行動」的核心動因，但卻改變了「連結性行動」的核心動因。在區分上述兩種邏輯的基礎上，本文重點介紹了大規模行動網路的三種理想化類型，這三種類型的運動在當代抗爭性政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關鍵詞：連結性行動 (connective action)、集體性行動 (collective action)、抗爭性政治、數字媒體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W. Lance BENNETT, Alexandra SEGERBERG

Translators: Anbin SHI, Yunkang YANG

Abstract

From Arab Spring and Los Indignado in Spain, to Occupy Wall Street (and beyond), large-scale, sustained protests are using digital media in ways that go beyond sending and receiving messages. Some of these formations contain relatively small roles for formal brick and mortar organizations. Others involve well-established advocacy organizations, in hybrid relation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using technology that enable personalized public engagement. Both stand in the contrast to the more familiar organizationally managed and brokered action conven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ovement and issue

W. Lance BENNET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Ruddick C. Lawrence Professor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Research interests: press-government relation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 digital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youth civic engagement.

Alexandra SEGERBER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ockholm University, Sweden.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empi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bin SHI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Yunkang YA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This article won the “ICA 2013 Outstanding Article Awar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advoca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that emerge when communication becomes a prominent par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argues that understanding such variations in large-scale action networks requires distinguishing at least two logics that may be in play: The familiar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the less familiar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based on personalized content sharing across media networks. In the former, introducing digital media do not change the core dynamics of the action. In the case of the latter, they do. Building on these distinctions, the article presents three ideal types of large-scale action networks that are becoming prominent in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 conn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action, contentious politics, digital media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Shi, A. B., & Yang, Y. K. Tran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6, 211–245. (Original article: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當全球經濟處在危機中時，20國首腦在2008年秋初開展了一系列會談以協調金融政策。無論他們在哪裏開會——無論是在華盛頓、倫敦、聖安德魯斯、匹茲堡、多倫多或首爾——都面臨着抗議示威的人群。在倫敦，反資本主義者、環保主義者以及非政府組織贊助的抗議行動由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幾次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是由包括樂施會、地球之友、求助兒童會、以及「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這樣知名的非政府組織主辦。這些鬆散的聯盟行動發起了名為「以人為本」(Put People First)的運動，動員公眾抗議各國政府為解決金融危機而提出的「照常運轉」的方案所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危害。這場運動的網站上張貼了如下簡明的宣言：

早在銀行倒閉之前，世界就在遭受貧窮、不平等和氣候變化帶來的痛苦，全世界採用的金融模式創造了一個在金融和環境上負載累累的經濟。我們的未來應當依靠以公平的財富分配、體面的工作和低碳為基礎的經濟 (Put People First, 2009)。

「以人為本」運動的高潮是20國集團峰會開幕的前夕，35,000人走上倫敦街頭，宣揚此次運動的主題。雖然倫敦「以人為本」運動激發了各種大型的以個人表達為中心的遊行，但它依舊展現了蒂利(Tilly, 2004, 2006)所總結的政治運動的「WUNC模式」：W(價值)，這體現在來自160多個著名民間組織的支援和眾多政府要員對抗議人群需求的認可；U(團結)，這體現在此次運動的井然有序；N(人數)：「以人為本」運動在倫敦20國峰會期間一系列抗議示威中規模最大，而且在歷年20國峰會期間進行的示威遊行中規模也最大；C(承諾)：這體現在來自20個不同國家的眾多代表參與到當地人的行動中，傾聽他們在海德公園的演講或是參加各種宗教活動。¹媒體大量的正面報導都反映了這些特點，出席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對示威者做出的回應也突出了這次事件的價值(Bennett & Segerberg, 2011)。²

20國集團峰會明確表示，包括美國、英國、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在內的各國將降低債務並且採取緊縮政策，但氣候變化問題卻被束之高閣，公眾的憤怒從美國小鎮麥迪遜蔓延至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各國公民發起遊行以抗議他們的政府。不管來自哪一個政治派別，這些國家

的政府都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從金融權貴集團的利益出發，使得他們可以不對公眾負責，甚至完全不受政府的監督。

令人吃驚的是，其中有些抗議運動幾乎沒有傳統的正式組織的參與。譬如，西班牙的「憤怒的人群」(Indignados)運動在2011年5月15日動員了60多個城市的人們進行抗議。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它成功地將政黨、工會和其它強大的政治組織排除在外。實際上，這場運動把這些政治力量看作是問題本身。然而，傳統意義上的民間組織支援這場亦稱為「五一五」(15M)的群眾運動，但他們只是向數百萬被金融和政治危機逼得背井離鄉的普通人致敬而已，充其量也就是給這場運動提供了一個「背景」。其中最清晰可見的組織是由豐富的、多層次的數字和人際傳播網路所組成的，它們以名為「真正民主」(Democracia Real Ya!)的網站作為中心。³截止本文定稿時，它已經連接了80多個西班牙當地城市和一些國際性的網上聯盟。「真正民主」既是一個網站，又是一個人數眾多、工作高效的組織。仔細考察這樣一個在「憤怒的人群」運動中的核心組織是有價值的，它能揭示媒介化、數字化的新型組織所具有的特點——雜糅性(hybridity)(Chadwick, 2011)。

「憤怒的人群」運動組織了各種線上和線下活動，其中包括面對面的籌畫和組織，在城市中心搭帳篷，穿越全國的遊行等。這場運動沒有正式的實體組織，卻能持續下去並且不斷壯大其力量，這令人驚訝。運動的參與者們建立了一個「無人領導」(leaderless)的、排斥工會、政黨和一些激進組織的集體身份/認同。一個西班牙研究小組對「憤怒的人群」運動的參與者做了一次調查。他們發現，與罷工、發生在某個地區的遊行和反墮胎運動等傳統的抗議活動相比，「憤怒的人群」運動中的個人和組織的關係表現出以下三方面的不同：(1)傳統抗議運動中的大多數參與者都承認，有確切地址的「紅磚加水泥」式的實體組織在運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只有38%的「憤怒的人群」運動的參與者做出了相同的回答；(2)在傳統的抗議運動中，絕大多數參與其中的組織都有會員制或相似的制度，但在「憤怒的人群」運動中，這樣的組織只佔13%；(3)在傳統的抗議運動中，不同類型組織(如政黨和工會)成立的時間在10年到40年之間，而「憤怒的人群」運動中組織的平

均壽命不到三年 (Anduiza, Cristancho, & Sabucedo, 2011)。儘管如此，也正因為這些有趣的組織上的差異，持續不斷的「憤怒的人群」運動吸引了600萬到800萬人參與，這在一個人口只有4000萬的國家不是一個小數目 (Rtve, 2011)。

與「以人為本」運動一樣，「憤怒的人群」運動取得了驚人的傳播效果，它把圖像和簡訊直接傳播給外界和公眾，也通過間接手段——即匿名發佈的Twitter和YouTube上的視頻成為主流媒體的信源——來傳播。抗議行動每天通過當地和國際媒體報導，相關報導大都是正面的。這一結論與我們耳熟能詳的一些結論不同。許多經典研究表明，訴諸體制外管道的街頭抗議往往很難得到媒體的正面報導 (Gitlin, 1980)。⁴在這場運動中，參與者彼此交流了對工作和經濟情況的看法，一致認為在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已經瓦解，所有的政黨和領導人都受到銀行和國際金融集團的操控。儘管「憤怒的人群」運動、「以人為本」運動與人們熟悉的那些民間組織沒什麼關聯，沒有領導人，也沒有組建傳統意義上的組織，但這兩場運動都符合蒂利所總結的政治運動的「WUNC模式」：即價值重大、眾志成城、參與人數眾多和忠於承諾。

這些越來越為人熟悉的、採用數字科技的行動網路出現了兩種廣義上的組織範式。第一種是像「以人為本」這類群眾運動，由議題宣導組織構成的網路在幕後進行協調，這些組織並沒有為抗議行動貼上「標籤」——諸如某個組織、某種成員身份/認同、某類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性行動的框架等。他們撒下了一個範圍更大的公眾參與網，借助互動數字媒體的力量，將主題個人化，利用社交網路技術通過個人化的社交網路將相關資訊傳播出去。由「憤怒的人群」運動和美國「佔領華爾街」為代表的第二種範式，在這種範式中，技術平台及其應用扮演了政治組織的角色。在這種網路模式下，政治上的訴求或不滿通過非常個人化的方式被表達和分享，並通過社交平台、網上協調平台以及電子郵寄清單等途徑迅速傳播。例如，一個很容易被個人化的行動框架——「我們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形成於2011年秋季美國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並且通過Tumblr, 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網路上分享個人故事和照片的形式迅速在全世界傳播。

許多傳統的社會抗議運動彙聚在一個旗幟下，由會員制的組織領導，並擁有自己的集體身份/認同。而新出現的這些社會運動更趨個人化，媒介化、數字化的集體性行動形成的範圍更廣、速度更快，並能更加靈活地順應不斷變化的政治目標，彌合不同議題之間的分歧。反觀「以人為本」、「阿拉伯之春」、「憤怒的人群」、「佔領華爾街」等運動，我們都會發現通過使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簡明扼要的政治口號可以直接傳遞給外界公眾。這些媒體素材還被當作傳統媒體的新聞來源。⁵除此之外，與傳統社會運動相比，這些媒介化、數字化的行動網路符合傳統社會運動的WUNC模式。上文中探討過的這些數字化、媒介化的行動與傳統的以組織為核心的集體性行動之間截然不同，體現了這兩種行動潛在的組織邏輯和作為組織原則的傳播所扮演的角色之間的巨大差異。

數字化網路行動(Digitally Networked Action)的興起引發了一些合乎情理的質疑：它到底新在哪裏，它對「有組織的異議行動」這一概念及其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意味着什麼？我們希望理解這些更為個人化的集體行動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它們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是哪些因素使它們能夠持續不斷地發展，在何種情境下它們能夠發揮政治上的有效影響？我們認為，要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認清支撐各種集體行動網路的不同行為邏輯。因此，本文提出了一個關於這些行為邏輯的概念框架，並以這個框架為基礎，進一步探究「數字化網路行動」這一現象。

我們認為，如果要充分理解當下出現的大規模、網路化的抗爭行為，必須區分以下兩個發揮作用的行為邏輯：人們比較熟悉的「集體性行動」和不太瞭解的「連結性行動」。這樣做可以促使我們發現三種理想的行為模式：其中一種模式遵循的是「集體性行動」的邏輯，另外兩種則屬於更加個人化的行為模式。它們與「集體性行動」的區別在於：正式組建的組織是否在貫徹連結性傳播邏輯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第一步就是要理解「數字化網路行動」，它不僅是連結性行動的核心，而且決定了我們如何界定「個人化傳播」，並且還決定了「個人化傳播」和數字媒體在連結性行動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

個人化的行為框架和社交媒體網路

在當今許多國家當中都出現了結構性分裂和個人化的現象，這一點構成了本研究的重要背景。從上個世紀70到90年代，在經濟全球化的壓力下，發達國家中原有的各種組織出現了成員不斷下降、組織忠誠度不斷降低的趨勢 (Bennett, 1998; Putnam, 2000)。在所謂「後工業民主國家」中，如此迅猛的巨變使年輕人的社會和政治取向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Inglehart, 1997)。個人化的趨向導致政治參與更類似於對個人願望、生活方式和不滿的表達。在各種傳播技術的說明下，數字化網路行動也波及到了非民主國家，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席捲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運動 (Howard & Hussain, 2011)。無論是後工業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大量心懷不滿的個人通過使用技術，抓住機會來組織各種集體性行動。數字化人際網路的连接催生了在廣場、營地、清真寺和大型集會中飽含強烈情感的、面對面的互動行為。

在個人化行為的產生過程中，各種象徵性的議題——例如環境、權利、女權和貿易公平——與傳統的社會運動或政黨的議題非常近似。但與那些通過社會群體認同、會員制度以及意識形態而組織起來的行動相比，個人化行動組織過程中的思想和機制都更加個性化。雖然不同社會裏具有多面性的個人化過程具有各不相同的表現形式，但它們都具有以下的共同特點：以個人生活方式為基礎形成靈活的政治認同 (Giddens, 1991; Inglehart, 1997; Bennett, 1998; Bauman, 2000; Beck & Beck-Gernsheim, 2002)；與集體性行動相關 (McDonald, 2002; Micheletti, 2003; Della Porta 2005)；有組織的參與 (Putnam, 2000; Bimber, Flanagin & Stohl, in press)。人們依舊參加人數眾多的行動，但其身份/認同則來自具有包容性的、意涵豐富的大規模個人表達，而不是源自意識形態認同或組織認同。

從以組織為基石的社會到個人化的社會，這種變化導致了更為靈活的社會「弱連接」型的人際網路的形成。這種網路促進了個人表達，並且引領了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的演變方向 (Granovetter, 1973)。人際網路從來都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幫助人們在社群中或是不同社群之間進行「定向」。但我們所處的「晚期現代」(late modern) 社

會所包含的人際網路則更趨「中心化」。它們超越了群體自身，其本身構成了核心組織(Castells, 2000)。這些人際網路是運用各種數字技術手段建立起來的，其規模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測量。數字技術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它建立了各種不同的社區，形成並組織起各種各樣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eBay的網上拍賣和發生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抗議活動。我們認為，在大規模連結性行動的形成過程中，「個人化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所具有的兩個特徵如下：

(1) 政治內容蘊含在便於個人化的口號中，如倫敦2009年的「以人為本」運動和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後期所推出的口號——「我們就是百分之九十九」。類似這樣的框架並不要求通過說服、辯論或者重新定義來彌合眾人對同一個問題所產生的分歧。這些個人化的行為框架通過吸收不同的個人訴求來挑戰一個需要改變的情境。

(2) 各類個人化的傳播技術使得人們能夠分享這些主題。無論是通過文本、微博、社交網路共用還是YouTube視頻混搭(mashups)，現實世界中的朋友或虛擬空間中彼此信任的「網友」之間的數字化連接促進了傳播過程的個人化。「線上」一些自發組織的協調平台的精密程度甚至超過了「線下」真實存在的組織。

我們追蹤了遍佈全球的抗議事件，發現紛繁蕪雜的個人化行為框架是在社交媒體上被傳播開來的。那麼，這些事件是怎樣傳播給外部受眾的？行動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我們認為，「分享個人行動訴求」和「社交技術手段」這兩個要素回答了上述的疑問。事實上，傳播網路已經成為政治行動的組織形式(Earl & Kimport, 2011)。我們仔細研究了抗爭行動的不同組織形式，發現它們不僅可被歸入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並且還形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在這個範疇裏，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性行動」讓位給「連結性行動」。

「以人為本」運動就屬於「抗爭行動」的範疇。這是因為有很多傳統組織(例如，教會和促進社會正義的非政府組織)都參與到了這個運動中。「以人為本」的網站是一個協調平台，就像傳統意義上的「組織」一樣。流覽該網站的訪客並沒有被要求效忠於抗議組織者的政治訴求。他們反而有機會接觸到了大量新鮮的社交技術手段，這些技術手段使得他們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向各種類型的政治目標受眾群體傳播他們的

思想。「以人為本」運動網站的核心是一個醒目的文字框，文字框的上方是一個醒目的電話符號，邀請訪客向「二十國首腦峰會」傳遞自己的訊息，其中很多訊息都具有「易於個人化」的特點。他們也有機會表達自己針對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可能的解決方案的想法。

作為一種個人化行為框架，「以人為本」既很容易形成，又很容易被不分遠近親疏的朋友們所分享。它是「文化因數」(meme)的典型例證。「文化因數」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包裹」(packet)，易於在大眾中傳播，因為它容易模仿，又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進行調適，也可以廣泛地與他人共用。文化因數是社會資訊流動的單元，它建構和連接了網路，類似於生物學的「基因」概念(Dawkins, 1989)。人們通過分享來模仿這些文化因數，並且使用個性化的表達加以「移用」(appropriation)後進行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反過來又會說明人們移用、模仿和分享(Shifman, forthcoming)。「以人為本」的抗議運動成為一種構造簡單、易於在人際傳播的文化因數，並通過報紙、博客、Facebook、交友網路、微博流、圖片分享網頁(Flickr)和其它類型的網站迅速傳播，還為後人留下了各種「蹤跡」。⁶事實上，一部分「文化因數」在該運動發生一年之後被傳到了多倫多，那裏的市民團體也把他們的抗議行動命名為「以人為本」。在2010年20國集團峰會期間，首爾的抗議運動中也有人舉着用韓英雙語書寫的「以人為本」口號(Weller, 2010)。

「憤怒的人群」運動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抗議者舉着旗子喊着「不要出聲，希臘人在睡覺」的口號，這是指希臘嚴重的債務危機和嚴峻的緊縮政策。這個口號很快從西班牙傳到了希臘，Facebook在該國的網站同意幫助示威者設定鬧鐘來叫醒他們。雅典則到處能夠看到這樣的標語：「我們醒了！幾點了？他們該走了！」；「不要出聲，義大利人在睡覺」；「不要出聲，法國人在睡覺」等等。這些努力大獲成功，個人化的抗議主題借助於網路，跨越了文化和國家的界線而被傳播出去。這也提醒我們，不是所有的個人化行動框架都能夠如此有效而廣泛地被傳播出去。事實上，這個口號在西班牙和希臘比在法國或義大利更容易傳播。這個有趣的案例使我們能夠同時探究成功和失敗的原因。僅僅是易於個人化這一點(例如，我個人對甲、乙、丙不滿，所以

我要加入抗議運動)，並不足以確保傳播的有效性。在不同類型的社會當中，採用這些口號的政治機遇和條件各不相同。例如，這個口號在義大利的傳播不夠理想，這是因為那裏已經建立了以喜劇明星兼政治鼓動家畢普·格里羅(Bepe Grillo)為核心的、廣受歡迎的反政府網路。在法國則是因為已經有了左翼政黨領導的抗議行動，而網上組織者在宣導和傳遞類似訊息與採取行動時則顯得笨手笨腳。

個人化的行動框架不是自動傳播的，而是通過彼此交流來塑造和分享主題的。在個人化和分享的互動過程中，傳播網路會逐漸被壯大，並且趨於穩定，各種技術手段和使用模式則逐漸發展成為組織性機制。在「以人為本」和「憤怒的人群」等運動中，傳播過程本身就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組織形式。

與個人化的行動框架相比，其它類型的運動更為明確地需要既有的群體(groups)和意識形態的參與。這些更為傳統的集體性行動很可能止步於社群(communities)之外，而且還需要除了傳播技術以外的資源來整合不同的集體性框架(Snow & Benford, 1988; Benford & Snow, 2000)。舉個例子，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倫敦另一個系列的抗議運動在「熔化20國集團」的名義下，由一些激進社團來發起和組織。這場運動沒有發起大規模的個人化表達，直接要求結束20國集團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中一些組織甚至還要求消滅資本主義。為了表達上述政治要求，這些組織呼籲人們參與集體性行動。無論這些行動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他們都試圖把各種觀點和行為全部吸納進來。雖然這些運動本身頗為戲劇化——參與者在四個象徵着經濟末日的馬車夫的帶領下，從倫敦老城的城門遊行至英格蘭銀行——但這些半無政府主義、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遊行所採用的仍是人們熟悉的反資本主義的口號：「攻佔銀行、活吞富人」等。這類激進運動的參與人數不多，僅有5,000人參加了前往英格蘭銀行的遊行，2,000人參加了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宿營活動。這類運動也顯得更為暴力，從總體上看獲得了負面的媒體報導(Bennett & Segerberg, 2011)。雖然這類運動給人民較高的期望，用「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方式讓個人付出了代價，在反資本主義的集體性行動框架周圍團結了各種社會力量，但它們缺少公共價值，因此既沒有得到公職人員的認可，也沒有借助於媒

體充分表達自身的訴求，參與人數也不夠多。與「以人為本」運動相比，這類運動並不符合蒂利所歸納的政治運動的「WUNC模式」。

集體性行動框架對個人的要求更高，它需要個人共用統一的身份/認同或政治訴求，後兩者同樣可以被看作「文化因數」。這是因為像「活吞富人」這樣的口號具有悠久的歷史，這句話可以追溯到盧梭的一句妙語：「當人們沒有東西可吃的時候，他們就會吃了富人」。這個「文化因數」連綿不絕地被傳承下來，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T恤衫上，出現在「史密斯飛船」(Aerosmith)和「摩托黨」(Motorhead)等搖滾樂隊的歌名裏。我們通過簡單梳理這個口號得以流傳的歷史脈絡，就可以看出「文化因數」傳播的順序：先是「移用」、然後轉化為「個人化表達」，最後與他人「分享」。個人化行動和集體性行動的「文化因數」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需要更為精緻的包裝和儀式化行為，才能被引入新的情境當中。舉例而言，當身着盛裝的遊行者在象徵着「金融末日」的四位馬車夫身後前進時，「攻佔銀行」運動的組織者上演了一出精心策劃的戲劇化儀式，這為參與者提供了一個類似於狂歡節的機會，讓他們充分展示各種創意。⁷相形之下，「融化20國集團」運動在話語上就顯得比較封閉，它要求每個參與者與其他人同心協力。「融化20國集團」運動設立了網站，但是它並沒有提供讓參與者表達自己心聲的手段(Bennett & Segerberg, 2011)。這充分表明，要求更為苛刻的、更具排他性的集體性行動框架都可以通過文化因數來傳播，但它們往往更容易遇到各種阻礙。這些阻礙通常是由各種政治組織、意識形態、利益、階級、性別、種族和「族群」(ethnicity)所界定的社會網路相互交疊所產生的，而克服這些阻礙，則需要社會化技術手段以外的資源。

文化因數有助於區分個人化行動和集體性行動的傳播機制之間的不同。我們將把「個人化行動框架」和「集體性行動框架」作為研究的總體性概念框架。這對概念的使用讓本研究與社會運動研究的分析框架保持了一致(Snow & Benford, 1988; Benford & Snow, 2000)。我們提出的「個人化行動框架」和「集體性行動框架」之間的不同，並不是指「線上」與「線下」的不同。所有抗爭性行動的框架都需要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來體現和實行(Juris, 2008; Routledge & Cumbers, 2009)。此外，很多正式的政治組織發現日益完善、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可以幫助他們降

低開展公眾動員和協調所耗費的資源成本，但社交媒體的使用並沒有改變他們組織活動的根本原則。相反，如果技術、個人行動框架和組織之間能夠做到有機互動，並且當組織願意降低對集體身份/認同保持一致的要求，從而接受參與者之間建立更為個人化的社交網路時，數字化的媒體網路就可以改變組織的「遊戲規則」。

集體性行動的邏輯體現了以等級制的機構設置和會員制組織為特點的現代社會秩序。這種秩序凸顯了組織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讓個人克服各種阻礙參與到行動當中，另一方面個人的損失有可能大於其邊際收益，尤其是當參與者可以「搭便車」時，便可坐享別人的成果。簡而言之，相比於以個人化行動框架為基礎、通過社交技術組織起來的數字化網路行動，傳統的集體性行動往往要求人們做出更為艱難的選擇，需要更多地改變自身的身份/認同而接受群體的社會身份/認同。集體身份/認同的傳播需要參與者接受更多的教育，承受更大的壓力，具備更高的社會化程度，而這些因素會給正式的組織帶來對資源的更高需求——譬如，要付錢做宣傳，租用辦公室，聘用專業的員工管理者等 (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⁸ 數字媒體可以說明他們降低開支，同時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組織行為的動態結構。

正如上文所述，被我們稱之為「連結性行動」的新模型正在處於晚期現代 (late modern) 的後工業民主社會不斷顯現，正式的組織失去了成員，組織關係正被大規模、流動性的社交網路取代 (Castells, 2000)。⁹ 連結性行動網路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的組織進行運作。根據其自身的邏輯，這類行動網路並不需要強大的組織控制，也無需構建一個象徵性的、統一的集體性身份/認同。我們認為，連結性行動的邏輯蘊含自身的獨特規律，所以應當採用符合其自身規律的術語來分析它。

兩種邏輯：集體性行動和連結性行動

社會運動和抗爭性政治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現象和行動 (Melucci, 1996;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arrow, 2011)。關於集體性行動新形式的研究反映了其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 (Chesters & Welsh, 2006)。很多組織形式都很難被歸類，尤其是因為它們會因時間

和語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顯現出複雜的異質性 (Chadwick, 2011)。另外，抗議行動和組織工作採用不同的科技，在網路上和現實生活中都會出現，這就讓線上和線下的區別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Earl & Kimport, 2011; Bimber, Flanagan & Stohl, in press)。

有些學者認為，當代的抗爭性政治在範式上出現了轉捩點——不同的組織和傳播方式互相融合，不同的議題相互重疊。例如，在1999年號稱「西雅圖之戰」的抗議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具有象徵性的「卡車司機和海龜」聯盟，身材魁梧的工會成員和穿着海龜服裝的環保人士一起遊行，抗議不斷壯大的新自由主義貿易政權。後者被視為對以民主制度為基礎的國家經濟體系和世界環境產生了威脅。一些學者在對這一事件的研究中發現，運動中仍然存在不少老式的會議，商討議題和組建聯盟 (Polletta, 2002)。與此同時，組織和個人越來越頻繁地通過使用數字化媒體來協調其行動，他們通過建立關係網絡，組織各種活動，向世界直接傳遞他們的觀點。這就意味着，在某種程度上由科技驅動的人際網路確實存在，它使高度個人化、媒介化的傳播過程成為組織多種形式的連結性行動的基本要素。

我們應當怎樣釐清以下問題：組織過程是什麼樣的？它導致集體性和連結性行動框架具備了哪些屬性？我們該怎樣確認本質上不同的行動框架之間的界線？換言之，集體性行動和連結性行動之間的區別有哪些？混合型的行動在哪些方面產生交集？我們通過辨別兩種行為的不同邏輯，為釐清以上複雜的問題和相互交叉的行動形式進行探索。這兩種邏輯分別與不同的動態模式有關，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將關注不同的維度。這是因為我們對兩種行為的熟悉程度不一，所以有必要把它們分開進行探究。對這兩種行為的「區別對待」也成為我們研究被稱之為「連結性行動」的那些當代政治行動的起點。¹⁰

我們更加熟悉的是「集體性行動邏輯」這一概念：它所強調的是動員個人參與以公共福祉 (例如，民主改革) 為目的的集體行動時出現的問題，而只有當這樣的公共福祉被聚合為大家共同的事業時，它才能夠被實現。奧爾森 (Olson, 1965) 對於這個問題做了經典論述，但他的論證邏輯有着更深的含義。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當人們僅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或是僅擁有共同的目標時，還不足以讓他們行動起來。

在規模較大的群體中，個人的貢獻微不足道，理性的個人會採取「搭便車」的策略——如果不做貢獻也可以享受成果，那麼碌碌無為就是更有效的行為方式。何況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做出貢獻，個人的努力反正也會顆粒無收。因此，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情況，對於個人來說，碌碌無為都是理智的。即使全體成員都同意個人的貢獻會使該組織變得更好，大家還是傾向選擇碌碌無為。我們應當關注的是原子化的、個人化的理性行為與掌握了豐富資源的組織之間的矛盾及其所導致的問題。他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法：強迫性激勵和選擇性激勵。這兩種方法都表明，組織具有監督、管理和分配的巨大能力。

因此，擁有各種資源的正式組織在協調人們的統一行動時就顯得非常重要。「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或簡稱RMT)最早將「集體性行動邏輯」應用到對「抗爭性集體行動」的研究中。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採用了奧爾森的集體性行動的框架，以及他所提出的以組織為中心的解決方案。起初，信奉「資源動員理論」的學者否認社會運動是社會功能紊亂所導致的非理性行為。他們把理性的個人「搭便車」現象看作是組織所面臨的基本挑戰，並將組織及其動員各種資源的能力看作是社會運動能否成功的基本條件。關於上述問題，學者麥卡錫和紮爾德提出了經典的理論闡述。他們對不斷增加的、支援「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的外部資源做了分析，聚焦於社會運動組織的「專業化問題」——即領導者如何整合資源來進行動員(McCarthy & Zald, 1973, 1977)。

當代社會運動領域的研究跳出了早期的「理性選擇」取向的窠臼，超越了「資源動員理論」的視角，逐步走上獨立發展的研究取向，更加關注身份/認同、文化、情感、社會網路、政治進程和「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等因素(Melucci, 1996;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Della Porta & Diani 2006)。雖然新的研究取向與「理性選擇」原則漸行漸遠，但即便在奧爾森最初的有關「理性選擇」的研究中，我們仍能發現，「集體性行動」的現代主義邏輯是以背景的方式存在的。這一邏輯與組織協調和身份/認同的獨特形式有關，其所關注的因素和問題包括：資源、領導者，結盟、協調異見、在文化和認識論基礎上形成的社群所形成集體性行動框架及其彌合不同框架之間的分歧的重要性。

相形之下，所謂「連結性行動網路」在穩定性、規模和一致性等方面與「集體性行動」有所區別。這兩類行動也是依據不同的原則而被組織起來的。連結性行動網路的特徵表現在：它是以更為個人化的方式由科技手段而組織起來的，在實施時不需要集體性身份/認同和不同層次的組織性資源。

集體性行動框架分析是被最廣泛的採用，並且將社會運動研究從「理性選擇」視角轉向更廣闊的「集體性行動」邏輯的研究取向。它關注的是與爭議性問題相關的、對集體性身份/認同進行共同闡釋的協商過程 (Snow, Rochford, Worden & Benford, 1986; Snow & Benford, 1988; Hunt, Benford, & Snow, 1994; Benford & Snow, 2000)。這一框架有助於保持個人對集體行動的情感承諾，並以此來動員個人，從而降低資源成本。同時，具有高度意識形態訴求的、社會排他性和衝突性的集體框架的形成也會導致組織的分裂。這一框架將有關社會運動的研究重點引向了以下問題：組織如何能夠成功地彌合其內部分歧？解決這類框架衝突需要領導者充分調動各種資源，彌合具有不同目標、對問題有着不同理解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分歧。因此，雖然社會運動的不同理論分支仍在不斷演進中，並且逐漸擺脫了經濟學上的「集體行為」模型的窠臼，但是很多理論分支仍然傾向於強調組織及其成員之間關係的重要性，而這樣的關係關乎不同組織網路結成的各種「聯盟」當中集體身份/認同的形成和分裂。

可持續的、有效的集體性行動需要借助於不同層次的組織的動員能力和領導力，從而形成共同行動的框架，彌合組織內部的分歧。政治機會的出現和消失影響了資源的精細化配置 (Tarrow, 2011)，但從總體上看，大規模的網上行動反映了集體性行動的邏輯，其特點是組織當中同時存在着數量巨大的不同群體，這些群體能夠有效動員和組織其成員和其他相關人員，讓他們共同參與到行動中去。在個人層面上，集體性行動邏輯強調社交網路中在人際關係中的作用。這樣的人際關係是開展組織動員——即形成並傳播行動框架，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以及團結、相互信任的人際關係——的前提條件。在組織層面上，研究者聚焦於如何在擁有不同立場和支持者的不同組織之間展開策略傳播，從而達成共識 (Diani, 2011)。在社交網路中，以集體性行

動邏輯為特徵的行為動因並沒有由於數字媒體的使用而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分析的重點是：參與行動者是如何運用數字媒體來做他們之前已經在做的事情的(Bimber, Stohl & Flanagin, 2009; Earl & Kimport, 2011)?

在當代社會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上述集體性行動邏輯為特徵和標誌的社會運動及其行動框架。還有很多其它類型的社會動員也遵循了這一邏輯，乍看之下它們很像社會運動，但一旦仔細觀察後，便會發現它們缺少了傳統社會運動所具備的重要特徵。如果我們將其歸類為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就無法充分理解當今這個時代的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最有趣的問題——這些難以接觸到的、更難以共用集體身份/認同的、碎片化的、個人化的群體是如何被動員起來，進而能夠掀起從華爾街到馬德里再到開羅的抗議運動？當人們的社會取向逐漸被個人化之後，他們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心理上都很難使用現代主義所界定的政治運動或組織的形式。換言之，政治動員的資源成本大幅攀升，而收益則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把這些零散的個體組織起來，還要消除前文探討過的「搭便車」現象，並且幫助他們形成共用的身份/認同，上述這些不一定是組織集體性行動應當遵循的最為成功或最為有效的邏輯。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借助於移動通信和電腦技術熟練地使用社交網路，他們就會尋求更為個性化的路徑來協調彼此的行動。實際上，他們所遵循的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組織邏輯：連結性行動的邏輯。

連結性行動的邏輯和前文中提到的諸種行動邏輯有着顯著的不同。數字媒體成為組織的代理手段，也成為連結性行動邏輯的核心。一些關注集體性行動的學者重點研究了以下問題：數字傳播技術是怎樣改變奧爾森，提出的集體性行動的經典理論模型的？一些研究者發現，當傳播成本顯著降低時，奧爾森理論的基本假設——在大規模群體中個人對集體的「弱關係」(即前文中探討過的「搭便車」現象)——便會導致完全不同的表現(Lupia & Sin, 2003)。另一些研究者則指出，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模糊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界限，以往「搭便車」的人發現自己更容易加入到公私領域界線模糊的政治網路中，而「公共福祉」的定義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Bimber, Flanagin, & Stohl, 2005)。

Benkler (2006) 闡述了數字化、媒介化社會網路蘊含的經濟邏輯，值得我們關注。他提出，當個人化的表達內容被他人分享、認可並且被重複表達時，人們便獲得了參與行動的自我激勵機制。當負責協調和調整社交網路的形態各異的技術平台啟動了人際網路時，隨之引發的行動接近於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性行動」，但其中並沒有正式組織的參與，也沒有被改變的社會身份/認同。社交網路用「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的機制代替了那些等級森嚴的組織所採用的分配資源和維繫關係的模式，這就展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學和心理學邏輯——基於個人化表達的共同生產和分享。但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網上傳播都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只要看一看大多數網路報紙、博客或政治運動網站，我們就會清楚地發現，以「紅磚加水泥」的實體組織為中心的現實生活的邏輯通常在網上被不斷地複製，除了效率的提高，組織的邏輯幾乎沒有變化 (Bimber & Davis, 2003; Foot & Schneider, 2006)。即便如此，很多社會化、媒介化的網路的確是在以「另類邏輯」運行。這一邏輯回答了以下問題：為什麼人們要無償地從事集體勞動，從而創造出免費的開放原始程式碼軟體、維基百科和維基解密等工具來為那些社會抗議網路「賦權」？

按照連結性行動邏輯，採取公開行動或為公共福祉做貢獻即是個人表達的行為，也是基於相互信任的關係，通過分享觀點和行動而獲得自己和他人+認可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參與者可能會來自世界的另一端。但這種聯繫並不需要借助於俱樂部、聚會等形式，也無需基於共用的意識形態框架。集體性行動要設法激勵個人為組織做出貢獻，但連結性行動從一開始就是完全自發的（儘管並不一定以自我為中心），通過在社交網路中分享已經內化或個人化的觀點、計畫、形象或資源來進行自我激勵。人們通常在社交媒體（例如Facebook）上，或更加公開的媒體平台上（例如Twitter和YouTube）通過評論和轉發進行分享。¹¹人們通過數字技術進行傳播，並且與易於擴散的個人行動網路相結合，這就形成了一個遵循連結性邏輯的、不斷成長壯大的行動網路。這一行動網路本身就成為一種組織結構，也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

這種借助於技術手段而形成的個人化傳播網路不僅僅意味着資訊的交換。它具有較強的靈活性，並且易於重組。上述特點意味着，這

類網路不僅僅是線上空間及其線下的延伸活動所構成的一種傳播系統，而成為了一種具有較高靈活性的組織。當行動過程中的政治目標發生改變時，傳播網路能夠迅速做出相應的調整和行動上的協調。這種調整甚至超越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正如一些學者(Diani, 2011)所指出的那樣，傳播網路不僅僅是集體性行動發生前的準備，它們本身形成了自足的組織，能夠超越組織和個人的基本結構。¹²如同上文提到的那樣，傳播技術並未改變遵循集體性行動邏輯的大型社會網路，而是改變了那些遵循連結性行動邏輯的行動網路。

我們可以用Latour (2005)提出的「行動者—網路」理論來更為清晰地闡釋由人與社交媒體技術構成的組織結構，從而把數字化的網路運行機制(例如，各類社交媒體及其工具)視為在連結網路的潛在的「仲介」(agent)。這種數字化機制包含了以下一些工具：組織化的連接者(如網址鏈接)，行動協調者(如抗議活動的日程表)，資訊的共用(如YouTube和Facebook)以及「內嵌」式的多功能平台(如Twitter或Facebook中的帖子所包含的鏈接)。這些技術手段不僅提供了線上的會議平台，協調了線下的活動，而且還根據不同程度的透明度、隱私性、安全性和人際間的信任程度來調整人際關係。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化「痕跡」會被保留在網路後台，就像傳統的集體行動中的「儀式」和「會議紀要」那樣為後人提供記憶和檔案素材。

顯而易見，無論是從身份/認同還是從選擇過程來看，集體性邏輯和連結性邏輯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動邏輯，所以應將它們區別對待。傳統的集體行動往往最終未能發展成為持續的、有效的社會運動。同樣道理，媒介化、數字化的網路行動結果也是不確定的，通常還會遭遇慘敗。通過網路傳播的個人言論能否不斷升溫、趨於穩定並最終演變為集體行動，這要看參與者所設計和利用的社交技術的種類，以及言論的主題能否激起大規模的憤怒和同情。因此，如果不是受「阿拉伯之春」或西班牙「憤怒的人群」運動的啟發，如果不是因為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逐漸激起了流離失所的民眾的憤慨，「佔領華爾街」運動就不可能在一個月間從紐約擴散到全世界八十多個國家的九百多個城市。「佔領華爾街」運動設置了一個容易被個人化的行動框架——「我們都是百分之九十九」。雖然這一框架被廣泛傳播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場全球性運動，

但幾乎沒有一個可識別的政治組織參與其中，參與者甚至刻意迴避指定領導人和官方發言人。最明顯的組織形式就是記載參與者的新聞報導和展示各種個人化網路和工具的社交網站。其中一個網站名叫「2011年10月15日為了#全球變革而團結起來」（“15.10.11 united for #global change”）。¹³別的網站通常會設立「我們是誰」的專欄介紹相關的情況，而這個名為「全球變革」的網站卻問「你是誰？」

在同樣的行為體系中，集體性行動和連結性行動會以不同的形式同時出現。儘管如此，我們仍可區分三類清晰的、理想化的大規模行動網路。一類主要以「集體性行動邏輯」為特點，另外兩類連結性行動網路的區別主要在於正式組織在促進個人化參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相對而言，在自發組織起來的網路（如西班牙「憤怒的人群」、「阿拉伯之春」或從華爾街擴散到全世界的「佔領」運動）中，傳統組織扮演了較為次要的角色，而社交技術則扮演了主要角色。另一方面，與那些完全靠技術啟動的網路不同，在雜糅型網路（如「以人為本」運動）中，傳統組織在抗議行動的組織和議題宣導方面發揮着「幕後推動」的作用。如果傳統的集體性行動和連結性行動在一條軸線的兩端，那麼這種混合型的組織就在它們兩者中間的某個地方。下面的章節會介紹這三種行動類型的具體特徵。需要指出的是，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現實當中存在着跨類型的共存和疊加的情況。

集體性行動和連結性行動網路的類型分析

我們運用不同的行動邏輯（包括展現二者之間衝突的雜糅型網路）可以歸納出當代抗爭性政治中凸顯的三種大規模行動網路模式：一種是由組織化的網路作為仲介，具有集體性行動邏輯的特點。另外兩種類型都具有連結性行動的特點，但卻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網路。我們可以運用這三種模式來解釋以事件為中心的抗議活動中大規模行動網路之間的差異及其內部的動因。這裏所說的「事件」是指上文中討論過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我們也可以用這三種模式來解釋日常生活中的議題宣導網路。這種類型分析旨在幫助人們理解不同運動背後的動因，但是這些模式並不能窮盡我們對各種社會運動的闡釋。因此，我

們並不企圖全面把握——更談不上解決——社會運動研究者之間存在的分歧。我們只是想強調，這兩種形式的數字化連結網路與以往的社會運動截然不同，後者主要表現為依靠媒介化網路進行組織動員的集體性行動。

表一 連結性行動網路和集體性行動網路的要素

連結性行動 (自我組織網路)	連結性行動 (由組織激發的網路)	集體性行動 (由組織作為仲介的網路)
1 幾乎沒有組織協調行動	1 鬆散的組織性協調行動	1 強大的組織性協調行動
2 大規模的、對多層面的社交媒體技術的個人使用	2 組織提供使用社交媒體技術的費用(定製或是購買)	2 組織使用社交媒體技術對參與者進行目標協調與行為管理
3 傳播內容聚焦於各種新出現的、包羅萬象的、個人化的行動框架	3 傳播內容聚焦於由組織內部派生出的、包羅萬象的、個人化的行動框架	3 傳播內容聚焦於集體性行動框架
4 個人表達通過社交網路分享	4 組織通過社交網路對個人表達進行調控	4 對社交網路進行組織化管理，旨在為集體性行動建立人際關係網路
5 集體行為通常避免正式組織的參與	5 組織作為集體行為的「後台」，被鬆散地連結為網路	5 組織作為集體行為的「前台」，起到彌合分歧、建立聯盟、協調資源配置的作用

表一當中顯示了兩種「連結性行動網路」，同時把它們與更為人熟知的「集體性行動網路」進行了對比。表一最右側集體性行動的理想模式所描述的是依靠仲介機構促進合作、彌合分歧的大規模行動網路。倫敦20國集團峰會期間，直接採取行動的反資本主義團體就屬於此類。這類組織在壯大的過程中，發展出了更具排他性的集體性行動框架，因此也需要採取更多彌合分歧的行動。這類組織借助於數字化的社交媒體來進行目標協調和行為管理，而不鼓勵對問題的個人化解讀，也不鼓勵自行組織行動。一些經典的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網路也可以用這種模式來解釋(例如，McAdam, 1986; Keck & Sikkink, 1998; Bennett, 2005)。

表一最左側顯示的是連結性行動網路，這類網路沒有「中心」，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來「領導」。而是以技術為最重要的仲介手段來實現自我組織。雖然這類網路中也會有正式的組織來參與，但它們傾向

於停留在網路的邊緣地帶，或者以「線上」或「線下」的形式存在。在此類網路中，個人化行動框架替代了集體性行動框架，成為在基於信任的社交網路之間傳遞資訊的基本單位。上文中探討過的具有鬆散協調機制的「憤怒的人群」運動就是這類網路的典型示例。在這場運動中，傳統組織被刻意安排在網路的邊緣地帶，而便於調適的個人化的行動框架借助於社交技術平台——例如，名為「真正民主」(Democracia Real Ya!)的網站——游走於「線上」與「線下」。¹⁴

在表一中，由組織充當仲介的集體性行動網路和自我組織程度更高(即通過技術手段組織的)的連結性行動網路之間的便是上文中探討過的「雜糅型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作為「行動者」的正式組織不再主導議題的設置、政治符號的確定和集體身份/認同的動員，而是調動各種資源，運用社交技術手段，讓鬆散的公共網路圍繞個人化的行動主題而聚集起來。這種模式中的行動者還包括更不正式的組織。它們在不向其參與者強加政治符號和集體身份/認同的情況下動員資源、創立聯盟，從而具備了傳統組織的某些能力。¹⁵舉個例子，「佔領」運動中定期舉行類似於「聯合國大會」那樣的會議，分配資金和食物，商討分工，協調行動。此類會議成為整個運動的資源中心。同時，連結抗議運動的各個節點並由此衍生出的更大範圍的傳播網路大大加強了此次運動的影響力。圍繞整個運動所形成的技術網路而形成了鬆散的參與形式，其氛圍與面對面舉行的會議截然不同。在「聯大」式的會議上，全心投入的抗議者們與數量不斷減少的同伴們長時間地討論以下問題：怎樣才能擴大運動的參與面，同時又不能降低被他們視之為核心價值的投入度和行動水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佔領」運動中出現了一些組織層面的發展，但其根本屬性還是自我組織。

在傳統的正式組織中，參與者往往由於組織能夠提供的種種條件具有對身份/認同的強烈要求，並且能夠服從集體的要求。相比之下，雜糅型網路不是靠這種方式來吸引參與者的，而是運用「定製型」(如提供「傳遞專屬資訊」這樣的服務)或「外包型」(如在Twitter發送資訊)的傳播技術。這種模式與上文中討論過的「以人為本」運動相符。160多個民間組織——包括像樂施會、「淚水基金」(Tearfund)、天主教救濟會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等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到「以人為本」

運動中。他們刻意淡化了各自的組織品牌，形成了一個鬆散的社交網路，從而吸引公眾參與並協同行動。例如，在討論分頭進行抗議活動的日期等細節時，他們就是這樣做的(Bennett & Segerberg, 2011)。

居於表一中間的「雜糅型行動框架」的形成過程反映了基於興趣和利益而形成的正式組織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參與者不斷流失；組織與其追隨者們之間只能形成鬆散的、類似於企業與其雇員那樣的關係。相比之下，雜糅性組織除了利用社交技術與其追隨者之間形成鬆散的關係之外，不同的組織之間也能夠形成鬆散的關係，從而建立起規模巨大的、可以分享和整合各種不同動機的線上網路(Bimber, Flanagan, & Stohl, 2005)。儘管從規模和複雜程度上看，雜糅型網路與傳統社會交往中存在的「弱關係」截然不同(Granovetter, 1973)，但這類網路體現了連結性行動所具有的以下要素：鬆散的組織聯繫、技術手段的採用和個人化的行動框架。為此，我們做了一些研究來觀察這種「雜糅型模式」是如何促進個人化抗議網路中的一些議題得以擴散的。我們跟蹤觀察的是英國、德國和瑞典等國宣導的經濟公平和環保主義的一些網上組織，重點關注的是抗議運動、宣傳推廣活動和議題擴散的機制。¹⁶在上述各國的案例中，我們發現，這些抗議運動、宣傳推廣活動和日常的議題擴散機制都顯示出相似的組織特性：(1)知名的非政府組織和其它公民組織鬆散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整個運動中連結成網的支柱；(2)利用數字化的媒體網路讓公眾參與到有爭議的政治議題中；(3)在整個運動中，幾乎沒有採取如何措施，針對某個特定的組織進行品牌推廣、資訊管理和統一思想。雖然每個參與其中的組織肯定會有各自的政治議程，但它們最終都成為議題網路的成員，從而為個人行動賦予了公共性。他們很容易通過社交技術手段來分享形象和個人化的行動框架，這樣就吸引了更多人參與其中。

在雜糅型模式中，雖然那些「名牌」組織並沒有強力推廣其目標或政策議程，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會放棄其所宣導公共政治的使命及其相關議程。相反，在社交網路時代，很多組織仍然依據上文探討過的WUNC模式來動員大規模的潛在公眾，同時也在發生轉型——從遵循等級制的、以使命為導向的「非政府組織」轉向鬆散連結的「公共參與網路」。正如有些學者指出，這種「組織雜糅性」讓我們很難將現存的各種

組織進行嚴格歸類。它們從原來的「議題宣導型」的非政府組織轉變為政策智庫、發起各種抗議和運動的社會組織、多議題組織或者成為連結性行動的網路樞紐。換言之，它們會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以各種新形式出現：非政府組織 (NGO)、社會運動組織 (SMO)、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跨國非政府組織 (TNGO)、非政府開發組織 (NGDO)、利益宣導集團和政治網路樞紐等 (Chadwick, 2007, 2011)。因此，我們之所以要歸類出上述這些不同的行動邏輯，就是為了突破固有的組織模式，把研究的重點轉向在複雜的政治生態中混雜出現的不同類型的行動，以及這些類型的主導地位是如何隨着時間和機會的變化而變化的。

現實世界顯然比這三種模式更加複雜。在一些案例中，我們發現抗爭行動的形成過程完全符合這三種模式。倫敦20國集團峰會的抗議運動是一個少見的例子。在這場運動中的不同的階段，連結性行動與傳統的集體性行動之間涇渭分明。但在更多的案例中，不同的行動模式相互重疊，甚至於出現了暴力活動，打斷了以和平方式進行的動員。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2011年10月15日的「佔領羅馬」抗議運動，以及在美國多次出現的與警方發生衝突的「佔領」運動。而在一些相對分散的網路行動中，我們發現了一種非正式的「搜尋組織資源」的模式——即非正式的組織資源和傳播空間被連接和分享 (例如Twitter上的重新轉發)，這就導致了各種新興的政治問題和目標無需借助於具有固定政治目的的組織的整合而得以發展壯大。這一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第十五屆聯合國氣候峰會時出現的那些自我組織的微博網路。當這個網路將其參與者通過Twitter引向下一屆坎昆峰會時，我們發現各種各樣的組織連結在不斷增加，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博主的鏈接也在增加 (Seegerberg & Bennett, 2011)。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上述這些組織形式的變化來更為深入地闡釋以下問題：政治動員是否達到了不同的目標？抗爭行動在WUNC這四個層面上取得了怎樣的結果？

個人化的連結性行動網路正是以上述這些不同的方式與那些與更傳統的集體性行動網路——例如，社會運動組織、利益組織、具有一定「品牌意識」非政府組織——相互交疊，有時候還與不斷變化的個人化組織相互交疊。有鑑於此，雖然我們認為這類連結性網路本身就是

一種組織形式，但還是要強調，它們並不像正式的組織那樣運作，通常很難把握和分析它們。正式組織具有中心化的(例如位於實體空間的中心)、等級制的特徵，具有明確的範疇和使命，並且擁有明確數目的、背景可知的成員——例如，政黨擁有其黨員的人口統計資料。相比之下，當今許多議題網路是去中心化的(其成員既有直接參與的、也有只在網路上活動的個人和組織)、碎片化的、扁平化的。這些特徵是由多個難以界定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和議題上互相交叉，參與者因機緣的變化進進出出而造成的(Bennett, 2003, 2005)。因此，我們在分析連結性行動時碰到的挑戰之一便是：如何理解這類行動在動員公眾參與的過程中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

社會運動及其動員研究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獲得了大量成果。相形之下，有關連結性行動——包括自我組織的和由組織啟動的網路行動——的相關研究缺乏理論基礎，因而未能對此作出更為深入的闡釋。目前關於這種行動模式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描述」和「建議」的階段，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富有洞見的分析(例如 Castells, 2000; Rheingold, 2002)，但對其組織上的邏輯和動因還有待進行更為深入的闡釋——這也是本研究的關注點所在。這種模式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它們遵循了何種組織原則？弄清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行動模式在當今的抗爭性政治中日益凸顯的重要性。

結論

數字化網路行動(DNA)出現在處於「晚期現代」的後工業民主體制下。這一時期最為鮮明的特徵是：青年一代遠離政黨、廣義的改革運動和意識形態。個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參與組織化的政治，而許多組織也發現，它們必須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促進公眾的參與。公眾不一定要成為該組織的成員，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隸屬關係。同時，組織還要向公眾提供參與和表達的個性化方式。這包括為公眾在行動的創意和內容上提供更多的選擇，引進諸如個人化網路、內容生產以及技術研發等微觀的組織資源。即便如此，以排他性的集體身份/認同和緊密連結的社會網路為基本特徵的集體性行動在政治生活中依然發

揮着作用，但以數字媒體為其重要手段的個人化行動加入或融入——甚至於在某些情況下替代了——集體性行動，形成了能夠跨越不同語境、議題和規模的、更為靈活的數字化行動網路。

一些研究者狂熱鼓吹「數字媒體是促進民主和參與的力量」，這種觀點贏得了不少熱烈的回應。而對數字媒體持批評態度的人則把公眾參與視為政治運動中的「噪音」。實際上，無論對於鼓吹者還是批評者而言，誇大其辭都是無益的。理解連結性行動和集體性行動在促進民主方面的潛能和效果需要更為仔細的分析。同時，DNA 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滑鼠點擊主義」(clicktivism)¹⁷或將社交或組織行為「外包」給各類商業網站。¹⁸我們的核心觀點是：要充分理解 DNA 等新興的抗爭行為，不能滿足於對經典社會運動研究中的集體性行動模式做些修修補補，而是要認識到這是一種全新的行動模式。連結性行動具有自身獨特的邏輯和動因，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單獨分析。

連結性行動的關鍵是作為其要素的「分享」——即線民運用個人化手段使行動和內容通過社交網路被廣泛傳播。傳播技術使得社交網路不斷拓展，同時使其結構保持穩定。以技術作為仲介促進不同語境下的「分享」的機制，取代了集體性行動中的「搭便車」邏輯，從更廣義的層面上看，也取代了擁有豐富資源的組織所擁有的核心地位。連結性行動使人們開始關注網路重組的行為動因。換言之，網路及其傳播機制不再僅僅是一種前提條件或是資訊資源。我們在對這類網路中的研究中發現：傳播技術促成了一種新的結構化原則的產生，它與以資源、網路和集體身份/認同為核心的「集體性行動邏輯」截然不同。我們將其稱為「連結性行動邏輯」。

分析連結性行動的形成過程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這類行動在政治上是不是有效的、可持續的 (Tilly, 2004; Gladwell, 2010; Morozov, 2011)? 即使政治行動的輪廓在不斷變化，我們仍然應當設法探究連結性行動的持續性和有效性，從而有助於理解這類行動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運作的。

圍繞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了一系列針對 20 國集團峰會的抗議活動。它們都體現出了以下原則：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使用不同的組織策略，收效是完全不同的。2009 年在匹茲堡和 2010 年在多倫多爆發

的抗議運動與2009年倫敦的「以人為本」運動相比就極為混亂，而且不符合WUNC模式。匹茲堡的運動由於組織協調薄弱，並且由於警方攻擊而被迫中斷，因此，它試圖傳遞的刺耳的政治訊息遭到媒體的誤讀，甚至成了深夜電視脫口秀節目嘲弄的對象。《每日秀》節目派出一名記者，報導了匹茲堡的抗議活動。他報導的物件包括：敲鑼打鼓行進的、鼓吹西藏獨立的樂隊；宣導巴以和平的隊伍；譴責蘇丹達爾富爾大屠殺的標語牌；號召反毒品、譴責屠宰業的口號，以及一般抗議活動中都會出現的聲討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隊伍。一個抗議者舉的標語是「我抗議一切」，另一個打扮成蝙蝠俠的抗議者反對克利斯蒂安·貝爾出演蝙蝠俠。那位記者總結道，這場運動缺乏聚焦點，其參與者竟然向「茶黨」(Tea party)的成員請教如何進行遊行示威。在《每日秀》中亮相的茶黨「專家團」中有一位女士，她使用的是黑色的史密斯·威爾森(Smith & Wesson)牌的手槍皮套，上面繡的美國國旗上覆蓋着一個木制的十字架。當主持人問這些專家，匹茲堡的抗議者們哪裏做的不對？他們一致認為，遊行所傳遞的資訊出了問題。其中一名專家說：「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們到底要傳遞什麼資訊。」另一名專家附和道：「應該傳遞一致的資訊，並且堅信自己所說的話。」《每日秀》節目中插播了一段視頻。其中穿着黑武士制服的防暴員警組成方陣，與抗議者對峙。那位記者稱，警民對峙是在匹茲堡的報導中唯一可以被雙方理解的話題。如果不考慮幽默的因素，這個例子與倫敦「以人為本」運動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顯然更加有序，其所宣揚的經濟正義和環保主題贏得了媒體的正面報導(Bennett & Segerberg, 2011)。

相關研究目前所面臨的挑戰是：數字化網路行動在何種情況下能夠保證公眾持續的參與和較高程度的關注，而在何種情況下會變得混亂和失效？本研究認為，網路行動所具有的政治能力高低主要取決於以下問題：(1) 在由組織啟動的數字化網路行動中，是否有一個穩定的核心組織分享網上連結，並且能夠充分利用大規模的個人參與機制？(2) 在自我組織的數字化網路行動中，不同的網路本身是否相互重複，是否開闢了足夠的通道，能夠聚合個人化網路，激發具有感染力的個人化行動框架，並使之迅速得以傳播？

對連結性行動的研究並不能解釋所有的對抗爭性政治，也不能取

代對分析社會運動依然有效的經典的集體性行動模型。但是，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今在抗爭性政治中出現的一種重要的行動模式。經典的集體性行動模式不能充分闡釋諸如「阿拉伯之春」、「憤怒的人群」運動、「佔領」運動以及抗議全球氣候變化等社會運動的動因，而對連結性行動模式的深入分析則有助於我們理解上述這些現象，也有助於我們形成一個批判性的視角，更為深入地探究數字化時代公眾參與政治的重要形式。

注釋

- 1 歐洲其他城市如柏林、法蘭克福、維也納和羅馬也舉行了數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
- 2 美國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 請求失望的市民耐心等待世界各國領導人研究解決方案；時任英國首相的布朗 (Gordon Brown) 說，「我們在峰會上願意採取的行動就是要回應抗議者今天提出的問題。」
- 3 <http://www.democraciarealya.es/>
- 4 「憤怒的人群」運動不僅得到了西班牙媒體的大幅報導，而且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BBC世界新聞台在兩個月內至少播出了八條關於這個運動的報導，其中包括一則專題報導，詳細介紹了一群抗議者如何橫穿整個西班牙前往馬德里，還大量引用了對他們的訪談。
- 5 舉例而言，我們對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研究顯示，輿論對經濟不平等問題的關注度不斷上升，這主要與媒體對「佔領」運動的報導相關。雖然政治精英通常不願意把輿論對不平等問題的關注歸功於「佔領」運動，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媒體和輿論促使公眾開始關注這一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 6 倫敦示威發生兩年之後，我們在谷歌上搜索「以人為本20國峰會」(put people first G20)的相關資訊，仍然達到1,500萬條，其中與「抗議」相關的搜索結果達到75頁之多。
- 7 我們注意到，狂歡節式的或戲劇化的表達可能導致「去個人化」的表達。這也是一種傳播策略，即個人借用了由歷史或戲劇給定的表達方式。在此感謝同事 Stefania Milan 提供的這個觀點。
- 8 我們並不認為，當代學者對集體性行動的分析都要借助於資源動員理論（雖然其中有些是這樣）。無論有關資源的假設是研究的「焦點」或僅僅是「背景」，對集體性行動的分析大都根據以下的假設：正式組織和強大的集

體身份/認同所提供的成員之間共同的情感紐帶十分重要。但我們認為，在分析連結性行動時，這一點並不那麼重要。

- 9 雖然我們主要研究的是晚期現代(後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案例，但也試圖構建一些理論假設，用於闡釋諸如「阿拉伯之春」所產生的威權社會。威權統治也會導致個人化的行為。雖然這些人不能組建合法的市民社會，但仍能直接或間接地使用諸如手機等傳播工具。
- 10 Routledge與Cumbers(2009)做出了類似的判斷，他們在討論平行的和垂直的模式時認為，這些模式對理解全球司法網路的組織邏輯具有啟發性(參看Robinson & Tormey, 2005; Juris, 2008)。
- 11 Bob Boynton指出，分享行為不僅存在於像Facebook這樣的相互信任的朋友圈裏，也會發生在YouTube, Twitter和博客等更具公共性的平台上由陌生人組成的圈子裏。理解不同媒介網路間的內在聯繫和交叉關係對於本研究來說非常重要。
- 12 我們構想了一個新的視角，繪製出傳播網路的模式圖，並對各種數字媒體進行整理和歸類。這有助於我們認識技術在組織網路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這個視角修正了經典的集體性行動模式的切入點，後者重在考察個人與組織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係。我們擴展了原有的研究視角，將促進流動性行動網路形成的技術因素包括進來，當網路隨議題和事件的變化重組時，組織與組織之間、單個成員之間共用仲介手段，並且加以擴散(Bennett et al., 2011)。
- 13 <http://www.15october.net>
- 14 應當強調的是，在許多類似的網路中存在着面對面的組織工作，每日的議程和決定都線上下完成。但是，相互連結和行動協調都是線上上完成。
- 15 我們感謝匿名評審強調了這種類型的重要性。
- 16 我們曾經做過實證調查，主要關注地方、全國乃至國際範圍內的網路。一類是在公平貿易主題下推廣經濟正義的網路，還有一類是以氣候變化為主題宣揚保護環境的網路。這些網路都展現了高度的集體性和參與度，並且具有高度的可持續性。他們經常在地方、全國和全球範圍內合作舉辦各種活動，實現了上述兩類主題的交叉。這些議題網路是用來分析數字技術的使用以及不同類型的行動網路(從個人化的到集體性的)對公民的動員效果的典型案例。
- 17 「鼠標點擊主義」是所謂「懶散行動主義」(slacktivism)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指人們放棄了電話、郵件、傳單等傳統手段，轉而使用網上請願、表達對某種內容(照片、日誌、狀態)的喜歡、轉發等手段來參與政治活動——譯者註。

- 18 技術不是中立的。各種集體行為對商業技術平台（例如，Flickr,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利用和依賴的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對本研究而言，只需強調一些技術平台及其網路功能是由行動者為了建立政治網路和組織行動而設計的（Calderaro, 2011）。

參考文獻

- Anduiza, E., Cristancho, C., & Sabucedo, J. (2011). *The political protest of the outraged in Spain: What's new?*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n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 (1998). The unciv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identity, and the rise of lifestyle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1, 41–61.
- Bennett, W. L. (2003).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networked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2), 143–168.
- Bennett, W. L. (2005).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borders: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apacity in two era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D. Della Porta & S. Tarrow (E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pp. 203–226).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770–799.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forthcomin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 Lang, S., & Segerberg, A. (2011, March). *Digit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advocacy: Legitimacy and public engagement in national and EU issue net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Montreal, Canada.
- Bimber, B., & Davis, R. (2003). *Campaigning online: The Internet in U.S. ele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mber, B., Flanagin, A., & Stohl, C. (2005). Reconceptualizing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15, 389–413.

- Bimber, B., Stohl, C., & Flanagan, A. (2009).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shifting nature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A. Chadwick & P. Howard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net politics* (pp. 72–85). London: Routledge.
- Bimber, B., Flanagan, A., & Stohl, C. (in press). *Collective action in organizations: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and engagement in an era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aro, A. (2011, August). *New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case of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OSS) Mov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ECPR General Conference, Reykjavik, Iceland.
- Castells, M. (2000).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 Chadwick, A. (2007). Digital network repertoires and organizational hybrid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4(3), 283–301.
- Chadwick, A. (2011, August).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aper presented at ECPR General Conference, Reykjavik, Iceland.
- Chesters, G., & Welsh, I. (2006). *Complex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Multitudes at the edge of chaos*. London: Routledge.
- Daily Show. (2009, October 1). Tea partiers advise G20 protesters. Retrived October 6 , 2008, from <http://www.thedailyshow.com/watch/thu-october-1-2009/tea-partiers-advise-g20-protesters>
-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Porta, D. (2005). Multiple belongings, flexible ident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politics”: Between the European social forum and the local social fora. In D. Della Porta & S. Tarrow (E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pp. 175–202).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 Della Porta, D., & Diani, M.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 Diani, M. (2011). *The cement of civil society: Civic networks in local settings, Barcelo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Earl, J., & Kimport, K.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oot, K., & Schneider, S. (2006). *Web campaign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adwell, M. (2010, October 4).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86(29), 42–49.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Howard, P., & Hussain, M. (2011).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Democracy*, 22(3), 35–48.

- Hunt, S., Benford, R. D., & Snow, D. A. (1994). Identity fields: Framing proce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vement identities. In E. Larana, H. Johnston & J. R. Gu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p. 185–208).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uris, J. (2008). *Networking futures: The movements again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eck, M.,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vingston, S., & Asmolov, G. (2010).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foreign affairs reporting. *Journalism Studies*, 11(5), 745–760.
- Lupia, A., & Sin, G. (2003). Which public goods are endangered? How evolv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Choice*, 117, 315–331.
- McAdam, D.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64–90.
- McAdam, D., McCarthy, J. D., & Zald, M. N. (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Tarrow, S.,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1212–1241.
- McDonald, K. (2002). From solidarity to fluidarity: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collective identity”—the case of globalization conflict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2), 109–128.
- Melucci, A.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cheletti, M. (2003). *Political virtue and shopping*. New York: Palgrave.
- Morozov, E. (2011). *The net delusion: 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 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lletta, F. (2002). *Freedom is an endless meeting: Democracy 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Put People First (2009). *Send your own message to the G20*.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putpeoplefirst.org.uk/>
- Rheingold, H. (2002).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eus Publication.
- Robinson, A., & Tormey, S. (2005). Horizontals, verticals and the conflicting logics of transformative politics. In C. El-Ojeili & P. Hayden (Eds.),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pp. 208–226). London: Palgrave.
- Routledge, P., & Cumbers, A. (2009). *Global justice networks: Geographies of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tve (2011, August 6). *Mas de seis millones de Espanoles han participado en el movimiento 15M*.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11, from <http://www.rtve.es/noticias/20110806/mas-seis-millones-espanoles-han-participado-movimiento-15m/452598.shtml>
- Segerberg, A., & Bennett, W. L. (2011).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3), 197–215.
- Shifman, L. (forthcoming). *Internet mem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7–217.
- Snow, D. A., Rochford, B. Jr., Worden, S. K., & Benford, R.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64–481.
- Tarrow, S.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3r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 Tilly, C. (2006). WUNC. In J. T. Schnapp & M. Tiews (Eds.), *Crowds* (pp. 289–30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inocur, N., & Barkin, N. (2009, March 28). G20 marches begin week of protests in Europe. Retrieved July 9, 2011, fro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9/03/28/us-g20-britain-march-idUSTRE52R0TP20090328>
- Weller, B. (2010, November 11). G20 protests in Seoul. Retrieved July 9, 2011, from <http://www.demotix.com/photo/504262/g20-protests-seoul>

本文引用格式

蘭斯·班尼特、亞歷山卓·塞格柏格(2013)。「連結性行動」的邏輯：數字媒體和個人化的抗爭性政治(史安斌及楊雲康譯)。《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6期，頁211–245。(原文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致謝

本研究獲得了瑞典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Dnr: 421-2010-2303)